

重塑雁行模式

财经, 2013年1月28日

1月16日至19日, 安倍晋三进行他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的第一次外交访问。此次对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出访勾勒出日本未来一个阶段在东南亚外交的重点。

安倍晋三在最后一站印尼发表演讲, 明确指出日本对东盟外交的五原则: 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相同价值观; 一起维护海洋权益与航行自由; 推进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 发展与守护亚洲的多样文化; 促进日本与东盟年轻人的交流, 增进相互理解。

鉴于安倍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时所奉行的右翼政策, 他的表述被解释为日本试图拉拢东盟国家, 从战略上包围中国。但《财经》记者走访多位东南亚问题专家则多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角度作出解释。“以前东南亚国家十分感激日本在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但现在日本对东南亚的领导已经显得无所适从。”新加坡政策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研究员、曾任职于东盟秘书处的李荣荣(Lee Yoong Yoong)对《财经》记者说, “安倍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让日本经济再恢复活力。”

日本在前引领, 其他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发展上尾随其后的“雁行模式”深刻地植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四个率先进入工业化的东南亚国家, 也构筑日本在东南亚外交势力的基础。但随着日本经济近20年的持续低迷, “雁行模式”在东南亚逐渐失去向心力。

再加之在过去几年执政的民主党缺乏对东南亚外交的战略设计, 日本在经济和制度领导力上的丧失迅速蔓延到外交领导力。时隔三年, 自民党重新执政, 日本正寻求重新树立对东南亚的领导。安倍晋三的访问意味着, 日本正在把“雁行模式”再次推广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这四个东亚经济增长前沿。

面对萎缩而缺乏活力的国内市场, 廉价的生产要素和新兴的市场促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对中南半岛进行投资。

对于这些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 “雁行模式”的工业化道路, 以及保障国际贸易的自由通航, 构成了最重要的经济价值观, 这也成为安倍晋三力图推动的“价值观外交”的一部分。

提振投资增影响力

日本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 日本对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更达到100亿美元, 然而, 1月17日安倍晋三对泰国的访问却是日本领导人过去十多年来第一次访问泰国。

安倍晋三再度当选后, 一个首要目标就是提振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 向东南亚国家作出经济投入的承诺, 进而恢复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力。

日本的“雁行模式”曾经是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天然基石。日本在对东南亚进行外交过程中, 将雁行模式以及对东亚经济发展的理论化, 将这些国家对日本的崇拜和依赖概念化, 成为其意识中的一部分。

自上世纪 60 年代始，日本企业大规模向东南亚投资，在这里建立了大量的培训学校，对当地劳动力素质提高起到很大作用，即便今天，驻扎在新加坡的 7000 家跨国企业中，仍有一半来自日本。

但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企业的衰落，日本在区域的领导力已一落千丈。

这首先表现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上。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的十年间，日本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大幅减少。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对率先进行工业化发展的东盟四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投资，从 1997 年接近 7000 亿日元的高位一路狂跌到 2000 年的 1000 多亿日元。

不论是在金融危机还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搭乘“雁行模式”以及学习日本治理范式而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国家希望从日本获得经济发展的指引，在经济结构调整、监管系统改革等领域获得智力支持。然而，它们却一无所获。

这一方面来源于日本自身能力的缺陷。“二战”后领导日本产业的领袖们退休后，日企管理层出现断层，目前 45 岁至 55 岁年龄的企业管理者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执行者”身份被培养，如今也更多扮演着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而缺乏领导力。

“这造成了日企的治理结构进入一个没有领导力，靠共同决策制定战略的阶段。这种结构制约了日本企业在快速变化世界中做出调整的能力。”某日本物流集团新加坡副总裁对《财经》记者说。

与此同时，韩国跨国公司和韩国科技迅速挤入东南亚市场，就连山口百惠、三浦友和这些在东南亚国家红极一时的日本明星也逐渐被“韩流”明星所替代。

“韩国在过去几年的全球扩张态势，让日本企业一下子警觉过来，刺激了日本对于海外市场扩张，以及产业领导力的动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商业上的颓势同时导致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对该地区的忽视。特别是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在公共外交上的经费审核更是谨小慎微。新加坡留日学生会主席 Richard Chua 对《财经》记者说：“民主党上台后，就不再对东盟留日学生会在日本的机构给予经费支持。虽然每年只是一些办公用度，但这实际上可以撬动巨大的东南亚人脉资源。”

“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 G7 国家，然而它现在却在领导亚洲中显得无所适从。”李荣荣对《财经》记者说。

受到日本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商业税不断高企等投资环境利空消息影响，以及对中日关系的担忧，大量日本企业对有 6 亿人口的东南亚市场再度复燃热情，外交动作与之相辅相成。

2008 年，日本与老挝、缅甸、越南这些经济增长前线国家以及新加坡，签订了《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此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剧增，从 2009 年日本对东盟国家 FDI 总额的 38 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84 亿美元，2011 年又增长近 1 倍达到 153 亿美元，有预测称 2012 年甚至将达 200 亿美元。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最近访问新加坡时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商谈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表示日本将对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投入更多资源。“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信号，代表着日本愿意参与到我们的经济重塑之中，也就意味着，东盟国家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增长中去。”李荣荣对《财经》记者说。

与对能源、资源和基建等有限领域进行投资的中国不同，日本对东盟地区工业化程度的参与度更加广泛，对东盟工业制成品的吸收力也更强，其投资可以带来更高的附加值。因此，东盟国家亦期待一个经济强盛的日本。

聚焦中南半岛

除了安倍晋三第一次对外访问的三个国家中有两个位于中南半岛之外，1月2日至5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对同样位于中南半岛的缅甸进行访问，寻求加大对缅甸的经济合作。

中南半岛的柬埔寨、老挝、缅甸以及越南因其廉价的劳动力和有待开发的基建、电力与通信等工业化基础，被称为亚洲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成为大量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点。它们因英文首写字母组合而被统称为 CLMV。

这片经济处女地在过去十年发展迅猛，与周边亚太国家的贸易量剧增。其中，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3.52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007年的183.93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449%；东盟四国对 CLMV 的双边贸易也是从2000年的63.79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189.02亿美元，增幅达到196%。

相比之下，虽然日本与 CLMV 的贸易量增幅较平缓，仅是从2000年的50.6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5.61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依旧保持了对 CLMV 地区 FDI 的优势。根据东盟秘书处数据，1995年至2006年，CLMV 共获得268.28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其中日本占11.5%，新加坡占10.6%，中国与香港地区总和则为10.4%。

对于 CLMV 国家来说，走上工业化道路、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是它们各自国内经济发展的首选路径。

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为中南半岛地区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技术投入。根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数据，2010年，日本对缅甸的官方开发援助（ODA）为4569万美元、技术合作8109万美元；对越南投入援助4832万美元、技术合作1.08亿美元；对老挝投入援助6247万美元、技术合作4058万美元；对柬埔寨投入援助8065万美元、技术合作5203万美元。

与早前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经济发展相比，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等组织在 CLMV 国家间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它们也成为日本企业界的 FDI 和技术转让之外，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补充。

目前 JICA 对 CLMV 国家提供大量技术顾问，特别在越南将大量外交资源投入在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例如帮助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

JICA 还与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援机构一起，为中南半岛交通网中“缺失环节”的连接工程筹措资金，试图打通柬埔寨、越南、泰国、老挝和缅甸之间的陆路动脉。

与此同时，随着泰国在中南半岛的经济领导力凸显，日本也更加注重与泰国共同合作，加强对中南半岛的开发。泰国对 CLMV 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24.47亿美元陡增至

2007 年的 115.27 亿美元，增幅达到 371%；泰国对 CLMV 国家的投资亦占 CLMV 所吸收 FDI 总量的 4.2%。

在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中南半岛中，泰国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网。泰国不但是缅甸 Dawei 港口及工业园开发项目中的主要参与者，其公民社会力量更在老挝、柬埔寨、越南等湄公河流域国家起到地区领导的作用。

安倍晋三在访问泰国时表示，亚太地区发生了重大的战略变化，盼望与泰国合作，并呼吁泰国在东盟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实际上，JICA 的东南亚总部已经落户泰国，可以通过它来开展与这个地区的经济援助关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经援机构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JICA 更是将泰国评价为，从“经援接收国”到“合作伙伴”。